

李泽厚美学



LIZEHOU
MEIXUE

赵士林 著

李泽厚首先是一位哲学家，他的哲学思想有类似康德的丰富的完满性，有类似黑格尔的宏大的历史感，更闪烁着马克思的彻底科学精神；他还是一位思想史家，他在最深的层面上把握了中国人的灵魂、风神、智慧。他仅仅作为美学家，就已使“少年高旷豪举之士多乐慕之，后学如狂”。他是一位真正具有当代精神的学者，理趣情思、风神品貌，都表现出当代的深度。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LIZEHOU MEIXUE

赵士林 著

李泽厚美学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李泽厚美学/赵士林著.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2. 6
ISBN 978-7-301-20890-8

I. ①李… II. ①赵… III. ①李泽厚—美学思想 IV. ①B83-09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139811 号

书 名: 李泽厚美学

著作责任者: 赵士林 著

策划组稿: 王炜烨

责任编辑: 王炜烨

标准书号: ISBN 978-7-301-20890-8/B·1049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

网 址: <http://www.pup.cn> 电子信箱: zpup@pup.pku.edu.cn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50673

出版部 62754962

印 刷 者: 三河市北燕印装有限公司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650 毫米×980 毫米 16 开本 17.25 印张 196 千字

2012 年 6 月第 1 版 2012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35.00 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 (010)62752024 电子信箱: fd@pup.pku.edu.cn

前 言

按惯例,出本书总应写个“前言”,我却最懒得写“前言”。为什么呢?一是由于书总算写完了,想赶紧交出去;二是认为书的价值究竟如何,读者自会在文本中体会评价,搞个“前言”特别是好长好长的“前言”加以说明,总觉得有点画蛇添足。但本书确实有问题要在书前交代,故仍按惯例写个“前言”说明一下。

在台湾三民书局出版的《李泽厚论著集》的“美学”部分,李泽厚师有序云:“今日看来,如强调从本质论、反映论谈美学、典型、意境等等,似多可笑;但过来人则深知在当年封脑锢心、万马齐喑下理论挣扎和冲破藩篱之苦痛艰难;斑斑印痕,于斯足见。从而,其中主要论点又与后来之变化发展有一脉相沿者在。”

这段话针对的是“美学”部分的《美学论集》。这部《美学论集》初版于1980年,收入的文章绝大多数发表于20世纪50—60年代。有鉴于斯,本书介绍李泽厚美学思想,对其五六十年代的理论创获,无论在今天看来,特别是在李泽厚后来的学术贡献中显得多么“过

时”，仍然客观介绍，以见历史痕迹，以见时代巨变，以见李泽厚学术思想的发展脉络与创新精神。

由于同样的理由，对李泽厚使用的某些概念，不管其流变如何，一仍原貌，以见历史真实。如“主体性实践哲学”这个概念，李泽厚晚近已用“人类学历史本体论”代替了它。但本书介绍李泽厚美学的哲学基础，仍保留“主体性实践哲学”这一提法，只是加注略予说明。

历史不能不关注李泽厚的最新贡献。他从语言哲学的批判入手，清理了包括海德格尔在内的西方哲学。在他的新贡献中，非常重要是对当代占主流地位的西方语言哲学的解构。他独到地指出“太初有为”和“太初有言”可以作为中西哲学异途的标志，提出了语言为本还是生活为本的问题，这确乎是个根本的哲学问题。李泽厚认为生活是本源性的，语言是派生性的。

通过对中西文化的整合性的审视、反思和升华，李泽厚提出了“情本体”这个全新的哲学命题，这意味着一场哲学革命，它的意义伴随着历史进程将愈益彰显。“情本体”命题的提出和阐释，是对中西哲学乃至文化传统的某种承续，又是某种颠覆，更是因应时代、面向人类未来，对中西哲学乃至文化传统进行“转换性创造”的思想贡献。“情本体”来自于中国传统“体用不二”、理欲交融、使情成体的思维模式和价值取向。如他在《人类学历史本体论》中所说：“这个‘情本体’即无本体，它已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本体’。这个形而上学即没有形而上学，它的‘形而上’即在‘形而下’之中。康德、海德格尔都想去掉形而上学，但又建构了自己的形而上学。大概只有解构的‘后现代’，才有去掉形而上学的可能，但又流于真正的原子个人而物欲横流，失去任何普遍价值和社会性。也许，只有凭依理欲交融的‘情本体’，能走出一条路来？”

夹生的启蒙后，中国大地刮起浮躁的尘埃。海德格尔的忧思开始获得中国式的证明。当代中国文化经历知识—权力统治的极端形式，又沦为“耍贫嘴”的平庸时代。大众媒体的怂恿，正在使劣币驱逐良币。庸俗化、浅薄化、无厘头、油嘴滑舌，成为时代的宠儿。这样的时代，多么需要深沉的文化思考。让我们阅读李泽厚——李泽厚从思到诗，从《美的历程》、《华夏美学》、“思想史论”到《人类学历史本体论》。

从思到诗，从海德格尔到孔子，不是鼓噪中华文化优越论。中学必须经过西学的洗礼，甚至在运思的模式上，必须以“西学为体”。不能沉溺于“一阴一阳之谓道”，它什么都能说明，又什么都不能说明。中国传统的问题在于没有经历牛顿，就直接进入了爱因斯坦。这个文化的巨大的跳空缺口，必须要回补。我们的全部危机，都与此有关。在西学体系面前，“阴爻阳爻”的解释系统可以放到博物馆里去了。

中学、西学都是思与诗的契合，但西学偏于思，中学偏于诗。仅仅讲思，或流于无生命的教条；仅仅讲诗，或流于幻梦般的呓语。

思与诗的契合，就是“情本体”的契合，它生成“乐感文化”，指示着人类的未来，宛若星空，空灵而丰实。

李泽厚的学术历程，是怎样展示着这星空般的灿烂！

谨以本书，贺李泽厚八十诞辰。

这就是本书的“前言”了。

李泽厚美学目录

前言	001
导论 李泽厚美学思想的文化背景与当代价值	001
第一章 李泽厚美学的结构	035
第二章 李泽厚论美学的研究对象和方法	111
第三章 李泽厚论美的哲学	127
第四章 李泽厚论审美心理学	175
第五章 李泽厚论艺术社会学	197
第六章 李泽厚论中国美学史	221
第七章 “以美育代宗教”	245
后记	260

导论

李泽厚美学思想的文化背景与当代价值

李泽厚是当代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学者中最有学术原创性的哲学家、思想史家与美学家。

本书分两大部分，导论阐释李泽厚美学思想的文化背景与当代价值，正文阐释李泽厚美学思想的学术基础与理论构架。

本书力图深入地分析李泽厚美学思想形成的时代条件、历史因缘与文化背景，指出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的美学大讨论和 80 年代掀起的“美学热”，作为突出的学术文化现象，各有不同的时代原因、问题意识和思想局限。李泽厚关于美本质问题的“客观社会论”在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崛起为一大美学流派，体现了学术的创造性与哲学智慧，保证了美学大讨论的学术品质与理论水平，但也不能不受到当时思想界整体状况的限制。思维对存在的“苏式”马克思主义的约束，不能不从根本上桎梏李泽厚美学建构的创造性。80 年代以来，李泽厚则以主体性实践哲学（“人类学历史本体论”）为学术基础与理论构架，空前系统地展开了他的美学建构与文化学开拓，产生了巨大的社会影响。

本书的学术视野不是仅仅停留于对李泽厚美学思想的关注，而是力图通过对李泽厚美学思想的系统解析，深入地揭示其时代背

景、哲学深度与文化价值。

在很难出现哲学家的年代里,李泽厚作为一个哲学家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他的哲学思想有类似康德的丰富的完美性,有黑格尔那样的宏大的历史感,还有马克思那样的彻底的科学精神。李泽厚还以一个思想史家的视角,从极深刻的层面把握中国人的风神与智慧,他的思想脉络是从孔子到鲁迅的真实延续。仅仅作为美学家的李泽厚,就可以使“少年高旷豪举之士多乐慕之,后学如狂”(沈瓚:《近事丛残》),更何况他还是一位真正具有当代精神的学人,他的学术思想,凝聚着当代的深度与广度。

一、何以掀起美学热?

在1988年出版的拙著《当代中国美学研究概述》中,我曾这样描述当代中国美学的研究状况:“当代中国美学,大概是当代中国学术最热闹也最诱人的园地。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大讨论,是一次真正的百家争鸣。中经十年断层,又迅速形成一种更广泛、更深入的‘热门’局面,旧账未了,又启新端,派系之多,观点之繁,争论之烈,深浅之差,影响之大,都是极突出的。”^①

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美学大讨论与80年代伊始美学学科成为“显学”,堪称当代中国学术界出现的两次“美学热”。关于两次“美学热”的学科发展状况,上述拙著已有论列,本书感兴趣的是,当代中国,何以能够发生两次“美学热”?它们背后的社会的、时代的、文化的原因是什么?从社会学、学术史的角度看,“美学热”能够留给我们什么样的启示?

之所以提出这些问题,是因为美学在当代中国竟然能够掀起两

^① 赵士林:《当代中国美学研究概述》,天津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4页。

次热潮,无论从学科自身的时代命运来看(国外),还是从学科发展的社会条件来看(国内),都是十分独特、引人注目的文化现象。

从国外看,众所周知,美学特别是美的哲学在当代西方早已是受冷落的学科,甚至可以说,20世纪“分析的时代”开始后,西方已经没有传统意义的美学(美的哲学),而只有艺术分析、艺术批评、艺术理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文化批判理论尽管具有强烈的美学意味,但它与传统的美的哲学已有了划时代的区别。奉行斯大林主义的苏联对美学问题的关注似乎也没有掀起什么热潮。但偏巧在中国,却掀起了一场专门讨论美的哲学的核心问题——美的本质问题的大讨论。

从国内看,情况就更加引人注目。还有比细胞、天体、计算机更“超越”的吗?但它们又何曾逃脱被批判的命运?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由于极“左”政治的桎梏,斯大林主义的意识形态要求,学术文化已完全定于一尊,成为政治意志的传声筒。一次又一次的学术批判,从专业的批判演变成政治的批判(从批判《武训传》开始用政治批判解决学术问题),从“批判的武器”升级为“武器的批判”(从整治“胡风反革命集团”开始迫害文化人),新老学人无不心惊肉跳,如履薄冰。开展美学大讨论的1956年至1964年,正是从反右运动到“四清”运动的极“左”政治运动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的恶性发作时期,尽管政治运动、思想批判尚未达到“文革”那样的极端疯狂状态,但每次“整肃”,知识分子都是首当其冲的打压对象,学术研究已不敢越雷池一步,学术界已基本成为统一的意识形态要求的自觉、驯顺的工具。第一次“美学热”,恰好就出现在如此严重的社会、政治的高压氛围中。当其时,其他学科领域的政治批判风起云涌,哲学界批判冯友兰的“抽象继承论”、杨献珍的“合二而一”论,史学界批判周谷城的“时代精神汇合论”、翦伯赞的“历史主义”和“让步政策”论,经济

学界批判马寅初的“新人口论”、孙冶方的所谓“修正主义利润挂帅”……文艺界更不用说，一大批戏剧、电影被打成了毒草（京剧《李慧娘》、《谢瑶环》，电影《早春二月》、《北国江南》、《林家铺子》、《不夜城》、《革命家庭》、《兵临城下》、《红日》等）。但唯独美学，却几乎没有受到直接的政治冲击。以政治批判与构陷知识分子发迹的姚文元在美学大讨论中也写了几篇文章，但他当时只是以普通文化人的身份参与美学大讨论。尽管他当时的观点就已很“左”，但尚未套上大批判的战车。他的观点较之大讨论中某些观点，也并不“左”得特别刺眼。高尔泰由于主张美的本质的主观论被打成右派，但仅此一例，并没有影响讨论的持续进行。

在“文革”前的学术环境中，一个和哲学那样接近，甚至就是哲学的一个分支的人文学科能够掀起那样持久的热潮，而基本没有受到政治上太多的干预、批判。

这是侥幸，是偶然，还是奇迹？

到了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之初百废待举、举国上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时候，不是经济学等别的似乎更“管用”的学科，又恰巧是美学率先成了学子纷纷向往的显学。据我的亲身经历，20世纪80年代初的北京大学，在各专业的研究生招生与公共选修课中，美学专业总是名列前茅；李泽厚的《美的历程》，大学生们几乎人手一册；《美学译文丛书》成为新时期西学东渐的先锋，是当年最畅销的丛书……

原因何在？

二、鱼缸里的波澜

先来看第一次“美学热”——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美学大讨论。

《思辨的想象》回顾美学大讨论时分析道：“尽管这场讨论有诸多的政治前提和限制，但毕竟它是一场学术讨论，而没有完全像当时其他的学科和领域的所谓学术讨论一样变成一种政治批判。这可以说是新中国前30年学术史上的一个奇迹。……这个奇迹之所以发生在美学领域，和美学本身所具有的超越性质有直接的关系，还与当时参加讨论的人们，尤其是从一开始就被当做资产阶级反动美学思想的代言人、唯心主义美学思想的所有者来批判的朱光潜先生那深厚的学养、严谨的学风和他那坚持真理、不唯上、不畏强权的勇敢精神有关。”^①有道理，但不尽然。

“美学本身所具有的超越性质”是美学大讨论幸免于政治批判的直接原因吗？李泽厚也有类似的分析：在中国，美学与讲究党性、政治的“哲学”关系疏远，所以能够成为自由运用智力的游戏场所。那么，就对于政治、对于党性的“超越”或“疏远”来看，没有任何阶级性的自然科学不是更超越、更疏远吗？但就是在自然科学领域，从建国初到“文革”，竟搞了三十多次批判，批判的荒唐令人瞠目结舌：在遗传学领域，否定摩尔根学派，认为它是“反动的”“唯心主义观点”；在宇宙学领域，把宇宙学研究的有限、无限之争，粗暴地定性为形而上学与辩证法之争；在生物学领域，大批分子生物学，指责分子生物学创始人薛定谔搞“现代还原论”，“最后把一切还原为上帝的精英杰作”、“完全符合于资产阶级的政治需要”；在医学领域，将德国著名医学家威尔和的细胞病理学定性为“形而上学局部论”，威尔和则被打成“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凶恶敌人”；在天体物理学领域，黑洞理论被视为“资产阶级伪科学的标本”和“预言宇宙末日的谬论”；把

^① 聂振斌等：《思辨的想象——20世纪中国美学主题史》，云南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45页。

大爆炸宇宙论作为唯心主义典型进行批判,认为它“本质上只能适应宗教的需要,适应反动势力从精神上麻痹人民的需要”;大批科学巨匠爱因斯坦,说他是“本世纪以来自然科学领域中最大的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相对论则被诬为“地地道道的主观主义和诡辩论”。此外,心理学、控制论、共振论等学科被斥为“伪科学”,批判电子计算机的说法更令人咋舌:“资产阶级把电子计算机吹得那么出神入化,其实是把计算机看成他们自己的化身,或者把他们自己看成是计算机的代表,用以骗人骗己,麻痹人民的意志,转移阶级斗争的方向。”

就“深厚的学养、严谨的学风”和“坚持真理、不唯上、不畏强权的勇敢精神”来说,许多遭到批判的学者与朱光潜表现得同样出色,甚至更加无畏。例如梁漱溟,仅因说农民太苦,希望少收农民一点税,就受到批评,他居然敢要批评者收回批评,并说看你批评者有没有这个“雅量”。如果说梁漱溟因为和批评者曾是朋友才这样勇敢,那么主张“新人口论”的马寅初面对险些被打成右派的危难,面对康生与陈伯达等炙手可热的大员的批判与威胁,面对越来越严重的压力,却仍大义凛然地宣告:“我虽年近八十,明知寡不敌众,自当单身匹马,出来应战,直至战死为止,绝不向专以力压服、不以理说服的那种批判者们投降”、“不怕坐牢,不怕油锅炸,即使牺牲自己的性命也在所不惜”。还有孙冶方,面对康生无赖式的斥责“小小的一个经济所长,竟敢鼓吹利润挂帅”,他毫不畏惧,针锋相对:“我主张赤裸裸地交待自己的观点,想了什么,就说什么。我不管有的同志一讲到资金利润率,就说是修正主义观点(这样就无法讨论下去),也不管人家在那给我敲警钟,提警告,我今天还要在这里坚持自己的意见,以后也不准备检讨。”

梁漱溟、马寅初、孙冶方,哪一个没有“坚持真理、不唯上、不畏

强权的勇敢精神”呢？他们甚至更勇敢，遭到批判后仍旗帜鲜明、毫不妥协地坚持自己的观点。但他们注定要为此付出巨大的代价，而不会获得一点学术自由。梁漱溟非但没有体验到批评者的“雅量”，反而遭到他的痛斥：“梁漱溟是用笔杆子杀人”的伪君子、“反动透顶”，“是为了反对马克思主义才‘致力’佛学、儒家和柏格森的反动思想”，应“交代清楚他的反人民的反动思想的历史发展过程”。从1953年到1955年，梁漱溟遭到了连续三年的铺天盖地的政治讨伐。马寅初同样遭到连续三年之久（1958年到1960年）的口诛笔伐，并被迫辞去北京大学校长的职务。孙冶方不仅被戴上“中国经济学界最大的修正主义分子”的帽子，撤销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的职务，甚至被诬为与张闻天（时任经济研究所研究员）结成的“反党联盟”的头头。

之所以不厌其详地举出上面的例子，是要说明，当时的政治、文化氛围，绝不会因为学科“超越”或学者勇敢而获得哪怕是极有限的学术自由。那么，美学大讨论何以那样幸运，能够在学术定于一尊、学者动则得咎的时代热烈地讨论了八年之久呢？

首先应注意到，建国后的美学大讨论围绕的主要课题是美的哲学中的美的本质问题。这和当时的时代要求、社会氛围、政治主题具有内在的联系。美学大讨论其实就是在美学领域落实、推演“思维对存在”的“哲学”的问题意识，批判唯心主义，确立唯物主义，强化“苏式”马克思主义——斯大林化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哲学观的“一家独尊”的地位。这个意识形态的基本要求十分明确，所有参加讨论的美学家们都十分自觉地迎合或者说配合了这种意识形态要求。

正是在这一意识形态要求的根本制约下，美学大讨论肇端于蔡仪对中国的美学泰斗朱光潜建国前美学思想的批判，就一点也不偶